

中亚与西北边疆研究丛书



全球文化力量消长与 中亚政局变化研究

汪金国 著



兰州大学出版社

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

全球文化力量消长与 中亚政局变化研究

汪金国 著

兰州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全球文化力量消长与中亚政局变化研究/汪金国著.

—兰州:兰州大学出版社,2010.8

(中亚与西北边疆研究系列/汪金国主编)

ISBN 978-7-311-03586-0

I. ①全… II. ①汪… III. ①政治—研究—中亚

IV. ①D73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0)第 151941 号

责任编辑 高燕平

封面设计 张友乾

书 名	全球文化力量消长与中亚政局变化研究
作 者	汪金国 著
出版发行	兰州大学出版社 (地址:兰州市天水南路 222 号 730000)
电 话	0931-8912613(总编办公室) 0931-8617156(营销中心) 0931-8914298(读者服务部)
网 址	http://www.onbook.com.cn
电子信箱	press@lzu.edu.cn
印 刷	兰州残联福利印刷厂
开 本	710×1020 1/32
印 张	18
字 数	333 千
版 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0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11-03586-0
定 价	35.00 元

(图书若有破损、缺页、掉页可随时与本社联系)

目 录

导论	(1)
第一章 冷战后全球文化力量的消长变化	(9)
第一节 苏联的解体与俄罗斯文化力量的总体下降	(9)
第二节 社会主义阵营的坍塌与西方文化力量的飙升	(32)
第三节 宗教复兴运动与伊斯兰文化力量的上升	(46)
第四节 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及其文化力量的增长	(58)
第二章 中亚各国独立以来的政局变化	(66)
第一节 独立初期中亚政局的总体状况	(66)
第二节 稳中有进的哈萨克斯坦	(74)
第三节 进退维谷的吉尔吉斯斯坦	(84)
第四节 乱中求和的塔吉克斯坦	(95)
第五节 特立独行的土库曼斯坦	(105)
第六节 外强内危的乌兹别克斯坦	(111)
第七节 中亚各国政局变化比较及其前景展望	(117)
第三章 全球文化力量在中亚地区的消长态势	(127)
第一节 伊斯兰文化力量	
——填塞宗教真空,激发文化情结	(127)
第二节 俄罗斯文化力量	
——心有余而力不足,总体呈现颓势	(134)
第三节 突厥语民族文化力量	
——大造泛突厥意识,收效甚微	(143)
第四节 西方文化力量	
——借反恐进入中亚,巧取地缘主动权	(149)
第五节 中亚五国理性应对多元文化	(155)

第四章 全球文化力量消长对中亚政局变化的影响	(161)
第一节 苏联解体与中亚独立	(161)
第二节 俄罗斯甩“包袱”,中亚全面投向西方	(164)
第三节 西方欲进还退,中亚逐渐转向务实	(169)
第四节 泛突厥主义趁势而动,各国表现前热后冷	(174)
第五节 宗教文化复兴,民族传统精神回归	(177)
第六节 美国全面进入,中亚政局直面多种文化力量的挑战	(183)
第五章 全球各种消极文化力量因素在中亚的表现	(189)
第一节 “三股势力”:持久威胁	(189)
第二节 “双泛”思潮:先热后冷	(198)
第三节 霸权主义:欲“霸”不能	(207)
第四节 大俄罗斯主义:欲退还进	(216)
第五节 中国威胁论:别有用心	(226)
第六节 各种消极文化因素作用下的中亚政局及 中亚的应对策略	(235)
第六章 “颜色革命”	
——多种文化力量较量的一次演练	(241)
第一节 多种文化力量在中亚“颜色革命”中的较量	(241)
第二节 “颜色革命”与俄罗斯对独联体控制力的下降	(245)
第三节 “颜色革命”后各种文化力量在中亚的重新组合	(248)
第四节 “颜色革命”的实质及其经验教训	(252)
第五节 2010年吉尔吉斯斯坦大规模骚乱及其相关问题	(254)
结语	(267)
参考文献	(280)

导 论

中亚独立近 20 年,各国政局变化突显全球文化力量的消长。苏联解体,中亚各国独立,这一地区丰富的自然资源、潜在的经济和政治利益成为全球力量“追逐”的对象。反过来,所有这一切又无不影响着中亚政局的变化及其外交政策的趋向。

近年来,国内对中亚地区的突发性事件,诸如 2005 年吉尔吉斯斯坦的“颜色革命”、乌兹别克斯坦的“安集延骚乱”和 2010 年的“吉尔吉斯骚乱”等表现出极大的关注,有关这方面的报道和评论层出不穷,某些观点和结论对于我们进一步研究中亚问题有很好的借鉴和参考价值。然而,所谓的突发性事件,看似偶然,其实必然,它们是全球文化力量在该地区多年碰撞和较量的集中体现。从表面看,如系列“革命”、“骚乱”不能不说是突发性事件,但是如果将其置于整个中亚近 20 年政局变化的大框架之下,那么我们会发现,中亚政局的变化就是由这大大小小的诸多突发性事件综合连贯而成的。如果再将中亚政局的变化置于全球文化力量消长的大背景之下,那么我们会更加理性、理智地认识到,这种变化是全球文化力量在后苏联空间消长的必然结果,是一种长期的存在。

系列“革命”、“骚乱”可以说是中亚国家政局变化中的大事。这些“革命”、“骚乱”也在中亚引起了广泛的震动,同时也使中亚周边国家民众的心理产生了波动。然而,就其实质,我们可以肯定,这是中亚国家独立以来政局走势的一个阶段,是全球文化力量与中亚各国政局在后苏联空间互相作用的具体反映。这是因为,在每次突发性事件之后,我们都可以看到外界不同力量,尤其是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和俄罗斯两种力量的公开或暗中较量。

本书对文化力量进行了重新定义,认为文化力量是一种文化的吸引力和感染力、政治制度的生命力、价值观的感召力、民族的凝聚力、国际的影响力和控制力。在此定义基础上,本书分六章围绕着如下几个中心问题进行了论述并提出了自己的观点。

一、影响中亚政局变化的全球文化力量因素

中亚各国独立近 20 年,全球文化力量在该地区的消长已非常突出地表现了

出来。

(一)俄罗斯文化力量。中亚近代史可以说是一部“俄罗斯化”的历史,是俄罗斯(包括前苏联)将其引领到了现代化(尽管是畸形的)的发展轨道;“俄罗斯化”作为中亚内在的一种文化力量因素已经浸入其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尽管中亚继续“俄罗斯化”的外力业已消失,但是各国政局的变化无不与俄罗斯文化力量的消长密切相关。

(二)西方文化力量。在目前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中,追随西方文化,向西方力量靠拢,效仿西方社会的发展模式,无疑在很长时间内仍将是全球最“流行”的一种趋势。在这样一种面向西方的全球大背景下,处在文化交接点上的中亚各国同样也不会也不想“免俗”。这是因为,靠拢西方可以得到现实的好处(如资金和技术支持等),接受西方所谓的民主理念则可以捞取更多的政治资本。

(三)伊斯兰文化力量。中亚各国是传统意义上以信奉伊斯兰教为主的国家。尽管各国都宣布自己是世俗国家,禁止宗教参与和干涉国家政治生活,但是民众回归伊斯兰世界的心理和外部穆斯林国家的“青睐”与慷慨“赠予”,使得它们与穆斯林国家之间存在着割舍不断的精神和情结联系。

(四)突厥语民族文化力量。中亚各国独立以来都把恢复和发展本民族文化作为一项重要国策付诸实施,因此在其社会发展中,借鉴外来突厥语民族相对成功的发展经验便具有比较现实的意义。尤其是在中亚独立之初,各国领导人都对建立所谓的泛突厥语国家联盟表现出过极大的兴趣。

(五)中国文化力量。中国是中亚的东方近邻,双方有 3000 多公里长的边界线。中国古老而充满生机的文化和 30 年改革开放取得的成就,在很多方面值得中亚各国借鉴和学习,加之中国与中亚国家具有自然天成的地缘优势,使其不能不对中亚局势产生强有力的影响。当然,中亚各国近 20 年的政局变化自然也会影响到中国对外政策的导向。

(六)在开发和输出中亚能源,联合打击分裂主义、恐怖主义、极端主义和毒品犯罪等方面,中亚国家与西方、俄罗斯、中国以及伊斯兰世界的一些国家有合作的共同基础和契合点,这也是全球文化力量可以对其产生长久作用的最直接原因。

二、影响中亚政局变化的消极文化力量因素

在全球文化力量不断对中亚政局产生影响的同时,各种文化力量中隐含着的一些消极甚至具有危害性的文化力量也会突显出来,对中亚政局乃至其他地区安全产生负面影响。假设这些影响因素从中亚“溢出”,无疑会危及包括中国

在内的国家的周边安全乃至整个国家的安全。这些消极的文化力量因素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需要我们密切关注。

(一)泛突厥主义与某些分裂主义思潮。在很大程度上,冷战后中国新疆境内外出现的分裂主义思潮是受中亚操突厥语民族国家的独立“鼓舞”而兴起的,当然这其中不可避免地夹杂着泛突厥主义思想。

(二)泛伊斯兰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泛伊斯兰主义和宗教极端主义时刻都在窥视中亚政局的变化,它们企图利用全球文化力量在中亚争夺的“有利时机”趁势跟进,以求在中亚地区建立一个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国家。

(三)大俄罗斯主义和俄罗斯大国沙文主义。大俄罗斯主义和俄罗斯大国沙文主义在近现代中亚及其周边国家的历史上扮演过恶劣的角色,它们既会在俄罗斯强大时出现,也会在俄罗斯力量削弱时激发。

(四)以美国为首的大国霸权主义。西方文化作为目前影响力最为强大的一种力量因素,其影响无处不在,而且是全方位的。在中亚所谓的公民社会建设中,其国家建设、经济发展等诸多方面都需要借鉴西方的经验和来自西方的资金支持,这种源于内部对西方文化的需求和来自外界对中亚霸权的渴望使得两者一拍即合。

(五)中国文化的非确定性与“中国威胁论”。从地缘优势分析,中国文化在中亚地区产生影响将是持久的和互动的。只是目前我们还处在自身文化的重新审视和再认识阶段,尚不明确以传播什么样的文化为最好的切入点,这是目前对外文化传播中最致命的弱点。焦点集中在:最能够为他人接受的中国文化是与现代思想相结合的传统文化思想,而我们在很大程度上仍然对传统文化持有非理性的偏见甚至否定态度。另外,在俄罗斯和中亚国家相当数量的民众和上层人士中始终蔓延着“中国威胁论”;还有活动于中亚的一些分裂主义组织经常在大众媒体进行反华宣传,攻击中国的对内对外政策,使不明真相的民众甚至上层人士产生厌华、排华和反华情绪,并进而发展到同情和支持分裂主义分子的活动。显然,以上几点无疑都会对中亚国家与中国关系的发展、中国文化在中亚地区的传播产生消极、恶劣的影响。

三、“颜色革命”的实质及其经验教训

回顾发生在独联体国家的系列“颜色革命”,它们都有这样一些共同点:第一,革命都发生在前苏联边界地带,都处在几大文化力量板块的结合部。如格鲁吉亚位于欧亚交界处,是目前西方、俄罗斯和伊斯兰等几大文化力量的交汇点;乌克兰位于欧俄地缘政治的交叉点,是欧洲和俄罗斯文化力量直面交流的平台;吉尔吉斯斯坦是中国经中亚通往欧洲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中国、伊斯兰、俄

罗斯和西方等多种文化力量均可触及的地方;乌兹别克斯坦位居东西、南北交流的十字路口,目前处在伊斯兰、俄罗斯和西方文化力量的直接影响之下。整个中亚则是全人类现有强势文化力量北上南下、东进西出的集散地。从以上几点分析可以得出这样一个结论:谁控制了这些结合部,谁就打开了向前推进其文化力量的突破口。第二,“颜色革命”都发生在俄罗斯想极力保持其传统势力范围而西方欲千方百计推进其战略目标的敏感地带。第三,政治腐败、官僚主义盛行,经济落后,贫富悬殊,民众不满日渐上升,而原有领导人又无力找到解决问题的途径,所有这些都很容易使国内民众受到外界的操纵或蛊惑进而反对原有政权及其领导人。

那么系列“颜色革命”爆发的深层次原因和实质究竟何在?究其原因,第一,苏联解体后,人类发展史上现有几大文化力量的大交流、大较量时代业已开始。第二,美俄对势力范围、能源的争夺和价值观的较量已经具体到了各国的政治层面,这将关乎两国甚至伊斯兰极端势力日后能否在这些地区继续施加影响;第三,具体到各国新老政权交替这样一些事实,那么可以说这既是各种文化力量多年来暗中较量的一次集中爆发,同时也是新生代领导人接替原有政权领导人的一次总演练。究其实质而言,系列“颜色革命”表明,多年来西方价值观的渗透已颇具成果,俄罗斯的影响力继续下降,伊斯兰极端势力从未放弃在费尔干纳乃至整个中亚地区创建伊斯兰国家的“宏伟目标”。

四、文化及文化力量概念在本研究中的界定

(一)文化的含义

文化是人类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进程中积累并传承下来的劳动成果。文化作为人类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有着与人类本身同样古老的历史。人类自从脱离了“茹毛饮血”的动物时代,从其打造第一件石制工具起,便开始了文化的创造和传承过程。人类一方面改造着自然,使其不断的“人化”,另一方面又不断地改造并提升着自身。无论是“自然的人化”,还是人类自身的不断发展,都是与人类文化的创造、积累和发展分不开的。正是基于这种认识,可以认为,整个“人类社会的发展史”就是一部“人类文化的发展史”。至于“文化”的定义,古今中外,可谓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很多学者从各自所从事的学科角度出发,给予“文化”这一概念以丰富多彩的界定和阐释。

在中国古代,“文化”一词泛指“文治教化”。西汉刘向《说苑·指武》云:“圣人之治天下也,先文德而后武力。凡武之兴,为不服也,文化不改,然后加诛。”晋束皙《补亡诗·由仪》称:“文化内辑,武功外悠。”两者均取文化的教化含义。在西方,“文化”一词源于拉丁文 cultura。原意为土地耕耘和作物培育,指

农耕和园艺类的物质生产活动,后逐渐引申到精神生活和制度领域,用于人类自身心灵、智慧、情操、德行和风尚的培养教育,最终扩及一切知识乃至全部社会生活内容。19世纪中叶以来,“文化”一词成为学术和生活中使用最为频繁的术语之一,同时也成为歧义最多的用词之一。不仅各门学科对其定义不尽相同,即使同一学科对它的定义往往也是大相径庭。

目前,国内学者对文化有如下一些认识:从广义角度看,文化包括物质、精神、制度和生活方式等多种因素,是人的社会生活实践及其产物的同义语。从狭义角度看,文化主要是人类社会实践活动的同义语。^①所谓文化,从广义上讲,是指人类社会在历史实践中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从狭义上讲,则专指社会意识以及与之相适应的制度和组织机构,即政治、法律、道德、哲学、艺术和宗教等社会意识的各种形式。^②文化是关于人生和社会关系的意识,主要包括价值观、社会思想和道德。社会经济与政治实践是文化的基础与载体,一定的社会经济与政治状况形成与之相适应的文化。^③

《中华文化辞典》谓:“文化,或称人类化,它是人类价值观念的对象化,即人们创造的效用价值在传播中实现为财富的普遍过程;包括与纯自然现象对立的全部人类化现象,故又称‘大文化’。文化是人类的本质显现,人类在改造自然的同时改造着自身,在改造文化的同时把自身创造成具有思维—劳作机能的‘文化动物’,从而区别于消极适应自然的其他动物。”^④

《大英百科全书》援引美国文化人类学家克罗伯和克拉克洪《文化:一个概念定义的考评》一书的定义,较具权威性和综合性。该书共收集了166条有关文化的定义(其中162条为英文定义),这些定义由世界知名的人类学家、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哲学家和政治学家等界定。在这些定义中,主要涉及八个方面的内容:(1)社会组织、政治制度和经济关系;(2)积累起来的学问知识;(3)人们的全部生活模式;(4)个人从自己和其他群体中所获得的社会遗产;(5)思想感情、信仰方式;(6)历史沉淀;(7)伦理道德、价值观念及标准;(8)行为方式等等。

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文化有以下一些基本思想:第一,文化与劳动相联系,劳动是文化的基础。第二,文化是社会劳动的结果,劳动只有成为一般的社会劳动,才是财富和文化的源泉。第三,劳动者只有把自己进行劳动的主观前提(自由支配自己的劳动)与客观前提(劳动对象、劳动资料)结合起来,才成为文化的

① 沈壮海:《先进文化论》,高等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126页。

② 宋新宁、陈岳:《国际政治学概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263页。

③ 孙富江:《文化的定义、内容与作用》,《国际关系学院学报》,2003年第3期。

④ 冯天瑜主编:《中华文化辞典》,武汉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页。

源泉。第四,把“社会的”“财富”与“文化”并用,都表明文化决非指狭义的精神文化,而是一个广义的文化概念。^①

综上所述,对于“文化”这一概念,可以从广义和狭义两个方面来理解。广义的文化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实践过程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精神财富和介于这两者之间的制度财富的总和。狭义的文化特指精神方面的成果,即精神财富,是指以政治和经济为载体的全部精神生产的成果,包括文学、艺术、教育、科学、道德、宗教和哲学等方面的内容及社会意识的形式。鉴于研究之需要,本书对“文化”取广义概念。

(二)文化力量的界定

文化是“自然的人化”,是人类智慧成果的积淀并流传下来的时代精华,是人类生生不息的动力源泉。文化的本质就是“人化”和“化人”(哺育、教化),即人类改造客观世界,将自然状态加以人化,而后再以其经验和成果化人,提升人自己改造社会和自然的能力。文化具有认识功能、控制功能、教化功能、审美功能、凝聚功能、调节功能、传播功能、交际功能和适应功能等等。随着时代的发展,当今世界已经进入信息化时代,文化的重要性越发突显出来,国家综合国力的较量已不再仅仅是经济和军事实力的较量,文化力量的对比已提上议事日程。当今世界的竞争是综合国力的竞争和较量,综合国力是一个国家所有力量的总和,包括政治实力、经济实力、军事实力和文化力量(实力)等。随着冷战的结束,两极世界的瓦解,文化的力量日益突显,它贯穿于政治、经济、军事实力之中,是一种隐形的东西。一种文化一旦形成,它便会稳固地发挥作用。

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美国学者约瑟夫·奈提出“软实力”(Soft Power)概念。他是在与20世纪80年代风行一时的美国“衰落论”的辩论中提出这一概念的。在这场以历史学家保罗·肯尼迪于1987年出版的《大国的兴衰》为代表的“衰落论”的辩论中,约瑟夫·奈提出美国力量并未衰落的结论。此后,他分别在《政治学季刊》和《外交政策》等杂志发表题为《变化中的世界力量的本质》和《软实力》等一系列论文,并在《注定领导:变化中的美国力量的本质》一书中,明确提出软实力概念。此后,他在《硬权力和软实力》、《软实力——世界政坛成功之道》等著作中逐渐完善了有关软权力的理论。顾名思义,软实力是相对于“硬权力”(Hard Power)而言的。若将硬权力视为常数,则软实力就是变数或乘数,它倍增或递减综合国力。继此,这一概念日益为学者所关注。约瑟夫·奈将软实力定义为“当一个国家使得其他国家以其预期目标为目标时的同化权力”,继而认为“这种权力造就一种情势、使其他国家仿效该国发展倾向并

^① 孙晶:《马克思恩格斯的文化与文明概念考察》,《南昌大学学报》(人社版),2001年第1期。

界定其利益的能力,这一权力往往来自文化和意识形态吸引力、国际机制的规则和制度等资源。”^①

自从约瑟夫·奈提出软权力(软实力、软力量、软国力)这一概念以来,国际关系学界对于软实力的讨论就一直非常热烈,但是学者们并未能就软实力的含义及其构成要素达成一致看法,他们各抒己见,从多角度对软实力展开研究。据汇总,中国学者在2007年之前对软实力的研究可归为四类,即“Soft Power”的汉译问题、软实力的由来与发展、软实力的基本内涵和软实力理论的缺陷等。其中关于软实力基本内涵的讨论为最多,学者们在软实力的定义、来源、分类、特性、作用及其与硬实力的关系等方面做了大量研究。他们认为:“软实力为一国国际吸引力、国际动员力和政府国内动员力的总和。”^②“通过吸引别人而不是强制它们来达到你想要达到的目的的能力。”^③软力量的核心是文化,而且主要是文化中的核心,即价值观。软力量是民族文化影响力在国际关系中的反映。^④软权力是一个国家通过吸引而得到期望的结果的能力,它是通过说服其他国家追随或使它们赞同可以产生出期望的行为的制度的能力。软权力的资源包括:文化吸引力,意识形态吸引力,制度化的国内体系和竞争性的领导,适当的国际战略,确立国际机制的能力。^⑤

在1993年,美国国际政治学者亨廷顿在《外交》季刊夏季号上发表了《文明的冲突?》一文,提出了“文明冲突论”的观点。“文化”和“文明”的重要性在国际政治学界愈发突显出来。亨廷顿将世界划分为“七大文明”或可能意义上的“八大文明”,即西方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儒教文明、东正教文明、日本文明、印度文明、非洲文明和拉丁美洲文明。他进一步认为儒家文化和伊斯兰文化会联合起来对抗西方的基督教文化,冲突不可避免。冷战结束后,两大阵营土崩瓦解,意识形态不再是国际社会的国家之间亲疏的主要标准,时代呼唤新的理论解读国际社会。正是在此背景下,亨廷顿从文化的角度分析国际社会,开辟了解读国际社会的新篇章。但是,对于亨氏的观点,我们应该批判地来看待:其实文明之间不仅仅是冲突、矛盾,不仅仅是“零和博弈”,而更多的应是共处、共存和共赢。当今的社会是多元社会,在全球化的背景下,多元文化主义日趋明显,世界是丰富多彩的,不可能用统一标准、同一模式要求所有国家整齐划一,每个国家都有权利独立自主地选择自己的发展道路。

① [美]约瑟夫·奈:《硬权力与软权力》,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106-108页。

② 阎学通、徐进:《中美软实力比较》,《现代国际关系》,2008年第1期。

③ 章一平:《软实力的内涵与外延》,《现代国际关系》,2006年第11期。

④ 俞新天:《软力量建设与中国对外战略》,《国际问题论坛》,2007年秋季号。

⑤ 朱峰:《浅析国际关系理论中的“软权力”》,《国际论坛》,2002年第2期。

当今时代,文化的重要性日益为世人所关注。国家在制定内外政策时,也越来越注重文化因素。软权力,又称软国力、软力量、软实力,因为是个音译词,加之学者们从各自研究的需要出发,所以用词各异。本书对这些称呼不作具体区分,把它们作为本质意义上的同一概念。当今社会,文化更多的是一种力量,不仅仅是一种软力量,而且越来越多的表现为一种硬实力,重视文化力量的建设对于一个国家立足于国际社会至关重要。与此相适应,文化安全也就日益引起人们的重视。但是,文明之间不仅仅是“冲突”,而更多的是“共存”、“共处”和互相借鉴。文化力量之间的此消彼长有其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作为爱好和平的中国,在面对多种文化力量“集聚”中亚地区的情势,应立足现实、放眼未来,进一步加深对文化建设重要性和紧迫性的认识,加快自身文化力量的提升和加强在中亚地区传播文化的能力。

本书所涉及的“文化力量”,与“软权力”既相联系又有区别。本书以诸多专家学者关于“文化”、“文明”和“软权力”、“软实力”等概念的界定为基础,将“文化力量”界定为:文化力量是一种文化的吸引力和感染力、政治制度的生命力、价值观的感召力、民族凝聚力、国际的影响力和控制力。

第一章 冷战后全球文化力量的消长变化

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中亚各国独立,所有这一切本身就是全球文化力量在一个特定历史阶段此消彼长的一种表现。它突出的表现在俄罗斯文化力量不可遏止的下降,最终导致社会主义阵营的坍塌;西方文化力量的一路飙升,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势力在全球范围内甚嚣尘上;全球宗教文化(包括伊斯兰文化)的复兴和民族、民族主义意识的不断强化,导致全球范围内再次掀起争取所谓民族独立的民族主义浪潮。中亚五国独立,这既是全球文化力量在当今时代消长的直接产物,同时它也将成为多种文化力量竞相展现自我和角逐的一个舞台。因此中亚政局的变化不能不受到外界各种文化力量的影响,而外界多种文化力量的此消彼长又必然会在其政局变化中表现出来,其政局的变化同时也将影响到外界各种文化力量的调适与整合。

第一节 苏联的解体与俄罗斯文化力量的总体下降

俄罗斯这个国家以其广袤的领土、独特的地理环境、气候,以及强悍的民族而著称,它曾经创造了灿烂的文化和艺术。自莫斯科公国建立以来,随着其领土的不断向外扩张,俄罗斯自身实力不断增强,在国际上的地位与日俱增,至苏联时代可谓达到了顶峰。但是,随着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今日的俄罗斯已是今非昔比:国内发展所面临的重重矛盾和问题,国家定位的不明确,统一的意识形态和为人民所认可的国家思想的缺乏,独联体国家独立意识的加强,以及欧盟和北约东扩的压力,使得俄罗斯的战略空间大为压缩。目前的俄罗斯已不再是超级大国,充其量只能算得上是一个“地区性大国”,其文化力量总体呈下降态势。从全球文化力量消长的总的趋势来看,俄罗斯文化力量的下降态势还将持续很长一段时间。尽管它在中亚地区占尽了天时地利和“人脉”等多方面的优势,但“欲进却退”(有时还有前进的表现,只能说明它在中亚原有势力的强大)仍将是其文化力量在中亚地区的总体表现。

一、苏联及其解体

(一) 苏联的历史回顾

苏联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简称,曾有 15 个加盟共和国。存在时间自 1922 年 12 月 30 日至 1991 年 12 月 26 日,但人们习惯于将苏联历史从 1917 年十月革命后开始算起。1922 年 12 月,全俄第十次苏维埃代表大会召开,俄罗斯联邦、乌克兰、白俄罗斯和南高加索联邦等四个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全权代表在联盟成立条约上签字,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正式成立。

苏联最高领导人前后共计有七位,他们分别是列宁(在职 7 年)、斯大林(29 年)、赫鲁晓夫(11 年,政变下台)、勃列日涅夫(18 年)、安德罗波夫(2 年)、契尔年科(1 年)和戈尔巴乔夫(6 年,政变下台)。苏联历史共计 74 年,其中斯大林在位时间最长,达 29 年之久,曾一度形成斯大林模式,或称为苏联模式。

毫无疑问,苏联曾经取得过巨大的历史成就。这主要表现在:第一,它在人类历史上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创立了全民所有制和集体农庄所有制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基础,增强了工农联盟和各民族人民联盟,改变了原有的社会阶级结构。世界上第一个无产阶级专政国家得到巩固,这与当时动荡不安的国际形势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社会的稳定 and 国家的巩固,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了保障。从 1928 年到 1940 年间,苏联共建成约 9000 个工业企业,工业增长 9 倍,年平均增长达 16.8%。这样的增长速度,在世界工业发展史上实为罕见。第二,在两个五年计划之下,苏联一跃成为世界工业强国,之后又完成农业集体化,这使得它在极短的时间内赶上了当时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1932 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完成,苏联从一个农业国转变成为一个工业国。1937 年,第二个五年计划完成,苏联的工业生产总值跃居欧洲第一,世界第二。在这期间,苏联建立起了完整独立的工业体系,一系列对国民经济技术改造和国防建设具有重大意义的重工业部门,如汽车、拖拉机、发动机、机床和发电机等制造业应时而生。截至 1937 年,苏联已经实现了机器设备的自给并开始出口。毋庸置疑,苏联在高科技领域的发展也是极为突出的:它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把宇宙飞船送入了太空,建立了太空站等等。第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联和反法西斯联盟国家一道战胜法西斯德国,取得卫国战争的伟大胜利。这场战争的胜利使苏联的威望得到空前提高,苏联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日益突显。社会主义的规模和总体实力得以迅速扩大,全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数量从一个国家发展到 16 个国家。显然,苏联的胜利改变了人类的历史进程。战争不仅没有削弱苏联,反而促成了它的崛起。苏联以其巨大的贡献和牺牲,不仅在战争中居于主要地位,而且在战后世界安排中也争得了巨大的发言权。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形成的雅尔塔体

系就是这段历史的产物,而社会主义阵营的出现则既是中东欧国家共产党反法西斯抵抗运动胜利的成果,也是苏军解放行动的结果。随着红军在欧洲的推进,东欧地区出现了一批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这些国家后来组成了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可以说,苏联卫国战争的胜利,为人类的和平进步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这场战争的胜利使得苏联以世界两大强国之一的姿态出现在世界舞台上。所有这些,推动了战后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和世界进步事业的发展。^①

(二) 苏联的解体

苏俄自 1917 年成立起,就受到来自国内外各种势力的压力:国内有叛军的颠覆活动,国外有西方势力不择手段的敌视活动(政治上的不承认,经济上的封锁和军事上对苏俄境内叛军的扶植等),它们妄图将新生的苏维埃政权扼杀在萌芽状态。面对紧张的国际国内形势,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在经济上先后实行了战时共产主义政策和新经济政策,战胜了国内叛军,发展了国民经济。1924 年 1 月 21 日列宁病故,斯大林在战胜国内反对派后掌握了党和国家的实际领导权。随后,斯大林放弃了新经济政策,随即发动高速工业化、农业全盘集体化和政治上的大清洗运动,从而形成所谓的斯大林模式,即社会主义苏联模式。这一模式在那个特定时期的某些方面适应了当时苏联国内社会发展和国际环境变化的需要,取得了很大的历史成就,但是也为日后留下了巨大的隐患。苏联模式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曾经一度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却变得日益无法适应社会进一步发展的需要。苏联的悲剧就在于它不能根据不断变化的国内外形势和已经变化了的条件及时调整、完善和改革既有模式,兴利除弊,而是抱残守缺,从而致使这种模式日趋固定和僵化,直至最后丧失生命力。苏联的解体,确非偶然,它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有着深刻的政治、经济、文化、民族和对外关系等等方面的原因。

1. 苏联解体的政治经济原因

第一,高度集中的党和国家领导体制,臃肿的国家机构和官僚主义。国家权力过度集中于党,党的权力过度集中于中央,中央的权力过度集中于个人。^② 第二,干部任命采取自上而下的任命方式。干部的任免权均归于中央,下级只有服从的义务,选举制虽然被保留,但基本流于形式,其候选人主要由党组织内定,实行等额选举,没有差额,没有竞选。党政干部的委任制、终身制滋生了干部的特权化思想,造成了党与群众的疏远。党组织缺乏凝聚力,党的威信日渐下降,以

① 高放主编:《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 122 页。

② 高放主编:《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 年版,第 123 页。

致在苏联解体时,人们无动于衷,很少有人出来抗争。第三,缺乏有效的监督机制和监督手段。苏联实行立法和行政权相对统一的原则,即政行合一体制。但是,在实践中,苏维埃的权力却日益萎缩。联共(布)中央和国家机关都可以代行苏维埃立法机关颁布法律。最高苏维埃无法行使它对执政党监督和制约的职责。第四,国家安全机关地位特殊。克格勃可以不通过法律手续逮捕人、枪毙人,其权力甚至凌驾于党和国家机关之上。

在所有制关系上,国家所有制占绝对优势。由于苏联始终将所有制公有化程度看作社会主义成熟程度的基本标志,因而不断人为地加速所有制关系的改造,追求“一大二公”,以便向更高的发展阶段迅速过渡。在经济管理体制上,实行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部门管理高度集中。在经济结构上,优先发展重工业和军事工业。苏联不仅将“生产资料优先增长”理论绝对化,而且还错误地将是否优先发展重工业看作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工业化道路的基本区别,因而无条件地奉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其结果是导致经济结构畸形、比例失调,轻工业和农业长期滞后,使得一个领土面积居世界首位的大国最后竟落到连谷物都不能自给的境地。在经营方式上,实行粗放型经营。为了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苏联始终实行以高投入、高消耗追求高速度,造成社会财富的极大浪费和生产效益的低下。由于实行的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其经济增长是一种拼消耗的粗放型方式,由此而导致经济效益低下,缺乏国际竞争实力。至1980年代初,其经济发展已陷入停滞状态。

2. 苏联解体的思想文化原因

在思想文化方面,社会主义苏联模式的特点表现为:过度集中的思想文化管理体制;领袖言论成为真理与错误的唯一标准;公共舆论一律。^①所有这些都促成了国家对思想文化的严格禁锢并导致个人崇拜盛行,整个社会陷入思想僵化,这就是苏联解体在思想文化方面的原因。我们对此表示赞同,但是还想有所补充,苏联之所以解体,还与以下几点有关:党没有把握好意识形态问题,思想上没有做到与时俱进,丧失了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资格;文化专制主义窒息了人民群众的自主性和创造力;错误的知识分子政策使广大知识分子走向了其对立面,最终抛弃了这一政权;西方的和平演变,加速了苏联解体的步伐。

在意识形态领域方面,前期的苏联共产党代表了先进的社会文化发展方向,但是后期却丧失了代表先进文化前进方向的资格,思想逐渐僵化教条、因循守旧、安于现状和不思进取,最终陷入不能自拔的绝境而被人民所抛弃。在对待马克思主义方面,苏联共产党先是采取教条主义的态度,后又跳到了彻底背离和抛

^① 高放主编:《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与实践》,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26页。